

#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时间之管见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1920年夏,谭平山等北大毕业后回广州,途经上海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他们返回广州的时间,即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的时间,具体应在1920年7-8月间。由于广州早期组织创立后的一个时段没有具体名称和具体组织形态等原因,当事人甚至也不能感知其存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广州早期组织;创立时间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6-0016-04

关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以下简称“广州组织”)创立的时间,目前有1920年10月<sup>①</sup>、12月<sup>②</sup>、1921年春<sup>③</sup>、1921年3月<sup>④</sup>等说法。其中,1921年春和1921年3月这两种说法最为流行。对这些说法,笔者均不能苟同。笔者认为,“广州组织”创立的时间不会迟于1920年8月,当在1920年7至8月间。

## 一、谭平山等人参加了上海发起组

“广州组织”的创立,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陈公博的说法,“广州组织”开始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sup>[1]412</sup>。反过来说,他们三个人的入党时间,大体也就是“广州组织”创立的时间。笔者认为,三人入党时间应在1920年7月间。

1920年7月,谭平山等三人北大毕业后,途经上海回到广州。在上海期间,谭平山等与陈独秀进行过接触和商谈。按照李达的说法,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后,即函约谭平山等在广州组织支部<sup>[2]2</sup>。李达的说法表明,谭平山等是陈独秀物

色的在广州创建党组织的人选。既然如此,陈独秀就没有理由不直接在上海吸收他们入党,再委托他们回广州建党。

谭平山等此次途经上海,并非是简单的顺路,实际与上海的建党活动有关,且是受陈独秀之邀请。1920年6月,维经斯基在一封信中说:陈独秀“正给各城市的革命者发信”<sup>[3]6</sup>。20世纪30年代的一则史料也记载:“陈独秀找北平李大钊广州谭平山到沪。”<sup>[4]148</sup>除谭平山等应邀途经上海外,各地的社会主义者亦在此期间应邀纷集沪上。袁振英结束东游记者团活动回国经上海,陈独秀留其在新青年社工作,并负责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sup>[1]471</sup>;周佛海、李达从日本留学归国到上海,陈独秀邀请二人参加了上海发起组<sup>[2]2</sup>;张国焘、张申府先后南下上海,陈独秀就建党之事与二人进行了较深入的交谈,并希望二人回北京后与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sup>[1]139</sup>;刘伯垂由广州经上海入党后,受陈独秀委派到武汉发展组织;赵世炎、陈公培、施存统在上海入党后,分赴法国和日本留学。由此笔者认为,谭平山等此次上海之

收稿日期:2021-05-12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共成立前组织发展脉络研究”(AHSKF2019D001)

作者简介:黄爱军(1960—),男,安徽宿松人,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参见黄振位《中共广东党史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②参见胡华、肖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谭天度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③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页)、曾庆榴《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述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游慧冰《浅析谭平山与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红广角》2016年第4期)。

④参见陈谦《广东党创建于1921年3月》(《广州党史研究》1991年第3期)、黄穗生《社会主义道路的抉择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广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杨汉卿《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及其革命活动》(《红广角》2015年第6期)、林雄辉《陈独秀对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贡献》(《红广角》2015年第10期)。

行,陈独秀吸收他们入党,并委派他们回广州发展党的组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资料显示,谭平山等三人在上海期间,的确参加了上海发起组组织。材料一,就是上文引用的20世纪30年代那则史料的记载。材料二,1921年8月,陈公博发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以“隐语”的方式披露了参加上海发起组的信息。陈公博把参加上海发起组称为“结合了一个学社”,把出席党的“一大”称为“结束我未完的手续”<sup>[1]409</sup>。材料三,萧楚女1925年所写《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将谭平山、陈独秀、李大钊等六人列为上海发起组的发起人<sup>[5]53</sup>。材料四,1956年4月25日,《团结报》刊发的《谭平山副主席事略》记载,谭平山北大毕业后回到南方,“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sup>[6]362</sup>。材料五,历史文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记载,1920年年底,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受维经斯基派遣来到广州,他们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等三人均拒绝参加该组织<sup>[3]10</sup>。谭平山等拒绝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间接印证了他们在上海参加了上海发起组。因为当时“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sup>[7]236</sup>。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组织和纪律,而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即通过了纲领若干条,就具有了一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另外,在中共创建史上,除了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外,还有“南谭(平山)北李(大钊)中间陈(独秀)”的说法<sup>[4]403</sup>。谭平山在中共创建史上既然具有与“南陈北李”齐名的地位,那么在上海被陈独秀吸收入党就理所当然。此外,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后,其联系及介绍入党的对象,除了同事、同乡、学生等熟人外,就是新文化同人,特别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同人。周佛海因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所以当他在1920年夏抵上海后,陈独秀即通过张东荪的关系与之联系并吸收其入党<sup>[8]321</sup>。李达参加上海发起组的情况与周佛海类似<sup>[2]2</sup>。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袁同畴,因经常在《民国日报》等进步报刊发表有关社会改革方面的文章,陈独秀即通过民国日报介绍与之建立起联系,并邀袁同畴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sup>①</sup>。谭平山是北大的学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北大著名学生团体“新潮社”的成员,还是北大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的成员。

1918年4月至1920年4月的两年间,谭平山以《新潮》《政衡》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及社会变革的文章<sup>②</sup>,并开始实现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sup>[9]321</sup>。谭平山等完全符合陈独秀物色和吸收党员的条件,在上海被陈独秀吸收入党实属必然。

## 二、“广州组织”创立的时间

谭平山等在上海入党后不久即返回广州,并受陈独秀委托在广州建党。笔者认为,谭平山等返回广州的时间,即为“广州组织”创立的时间,具体应在1920年7至8月间。我们可作以下几点具体分析。

第一,谭平山等三人在上海入党后回广州,就创立党的早期组织的组织条件而论,此时的广州是完全具备的。如北京早期组织创立时,就只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旅日小组则只有施存统、周佛海二人。既然广州完全具备了建党的组织条件,而谭平山等又负有建党的任务,他们回广州后首先把党组织创立起来,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很难设想,他们会舍弃组党之事,反而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放在首位<sup>③</sup>。

第二,陈公博有关“广州组织”的回忆表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广州组织”之后<sup>④</sup>。陈公博的回忆还披露了一则传说,即“广东的共产党发源于北京大学”<sup>[1]412</sup>。这则传说包含了从外面带回广州之意,这表明,“广州组织”创立的时间与谭平山等人返回广州的时间具有一致性。他们三人回广州,即意味着“广州组织”的存在。他们三人回广州后所开展的系列活动,如发起组

①参见《袁同畴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编《中共创建史研究》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120页)。

②人民出版社1986年收集出版的《谭平山文集》,共收入谭平山在上述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共计17篇。

③流行观点认为,谭平山等在广州建党的第一步,就是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78页)、蔡洛《谭平山在广东建党中所起的作用》(《广东党史》1996年第4期);杨汉卿《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及其革命活动》(《红广角》2015年第6期)。

④陈公博回忆说:“仲甫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418页)。

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广东群报》、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不能简单认为仅与“广州组织”创建有联系、为建党作准备,恰恰是“广州组织”活动内容的重要方面,是“广州组织”已经存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第三,在中共创建进程中,上海发起组是各地建党工作的领导或指导中心<sup>①</sup>。从上海发起组到各地早期组织创建的情形来分析,先成立党的组织,再成立团的组织,是中共创建中的一项“规制”。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均是在党组织创立后,并由党组织负责组织起来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指派俞秀松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sup>[1]36</sup>,该团于1920年8月22日正式成立。北京早期组织成立后,就着手筹备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该团于1920年11月宣告成立<sup>[10]223</sup>。武汉早期组织成立后,董必武等人开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该团于11月7日正式成立<sup>[10]357</sup>。关于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党组织组织起来的<sup>②</sup>。济南的情况与长沙类似。正如包惠僧在谈到党团关系时所说:“当时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sup>[1]441</sup>。笔者认为,“广州组织”的创建,也应符合这一“规制”。

### 三、“广州组织”创立的特点

“广州组织”的创立,有其特殊性,突出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广州组织”创立于1920年7至8月间,是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中心城市发展起来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广州组织”的创立,“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页第一行”<sup>[1]440</sup>。

第二,“广州组织”创立时,只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个人。没有吸收当地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在各早期组织中是比较少见的。到中共“一大”前,“广州组织”自身吸收的成员仍很少。组织发展是中共早期组织活动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最能彰显其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广州组织”创立后组织发展方面存在的某种停滞现象,自然影响人们对其存在的感知。

第三,“广州组织”创立后的一个时段内,没有具体名称和具体组织形态。没有具体名称,在

各早期组织创立初期,是较普遍的现象,这与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一时还不能确定名称有关,现在流行的“中共早期组织”的名称,并非是历史上的名称。没有具体组织形态,可能与长沙早期组织类似<sup>③</sup>。按照陈潭秋《自传》中的说法,武汉早期组织也似没有具体的组织形态<sup>④</sup>。

第四,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广州组织”活动的主要形式。中共初创时期,党与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二者在人员构成和工作内容方面,均存在着重叠或交叉。如上海,党员不分年龄大小,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up>[1]36</sup>,且党的活动大多“以团的名义出现”<sup>[1]73</sup>。这种党团不分、党团一体的现象,在广州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成了党的化身。陈公博在回忆中,就是将各地团组织视为党的早期组织来加以描述的<sup>[1]419</sup>。

### 四、余论

历史文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记载:“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sup>[1]683</sup>。如何看待此记载?笔者认为,由于“广州组织”创立后的一个时段没有具体名称和具体组织形态等原因,当事人甚至也不能感知其存在。当事人未能感知早期组织的存在,发生在陈公博身上并非仅是个例,而是带有某种的“普遍性”。如长沙早期组织成员易礼容在回忆中就认为,中共“一大”前,长沙没有成立党

①李达回忆说:“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参见《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包惠僧回忆说:“上海没有支部之称,各地党支部的成立都是由上海党发动组织起来的,各党员的物色工作的分配,党纲的拟定,工作方针的决定都由上海党负责,事实上它形成了中央的作用。可是当时并没有中央这个名称。”“组织系统和工作程序都是由上海党部拟订分到各地区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441页)。

②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8页)、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③彭述之回忆,1920年9月他抵长沙时,从贺民范处了解到长沙早期组织的大体情形:“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99页)。

④1935年陈潭秋在《徐杰自传》中说:“1920年10月,刘芬受了陈独秀嘱托,由上海到湖北物色同志,他介绍我和董必武、张国恩三人入党,那时在湖北还没有党的支部,只有我和董必武同志二人而已。只在学生中进行了一些思想上的宣传。到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才开始努力于组织工作,湖北的党才渐渐建立起来。”参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53-669页)。



的组织<sup>[1]</sup>280-284。

对《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进行研读,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与史实不符之处。如说“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难道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不是做组织工作的合适人选?又如将《广东群报》说成了《社会主义者》日报。再如提到的两个俄国人和七个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但谭祖荫、刘石心在回忆中,均否定该共产党组织的存在<sup>①</sup>。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是由俄文翻译而来,该文献的俄文稿又是由中文或英文翻译而来。日本学者蜂屋亮子通过对相关俄译文的考证,提出大胆猜想:“俄文可能出自并不精通俄语人之手,因每种俄文的中译都有许多意思不明之处”<sup>[12]</sup>112。因此,对该文献记载的有关内容,我们不能简单确信。

###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 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6]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中共佛山市委党史办公室.谭平山研究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9] 陈登贵,巫忠.谭平山传[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0]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2]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中共创建史研究:第2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Opin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Time of Guangzhou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ANG Aiju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ummer of 1920, Tan Pingshan and the other graduate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joined Shanghai Initiative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way of Shanghai, and then went back to Guangzhou. The time for their return to Guangzhou was the establishment time of Guangzhou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should be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1920. Because there was no specific name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zhou early organization, the persons concerned could not even perceive its existence.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angzhou early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time

(责任编辑 沂 溪)

<sup>①</sup>谭祖荫回忆说:“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当时确实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刘石心回忆说:“我未曾听说过两个俄国人说要和我们建立广东共产党的事。”“当时两个俄国人的确没有找我们组织共产党,只讲合作,决定不合作时就分手了。”“我不知道当时有共产党……我的确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62、768-773页)。